

## ■ 新作聚焦

## 吴君长篇小说《万福》：

## 出走与还乡的隐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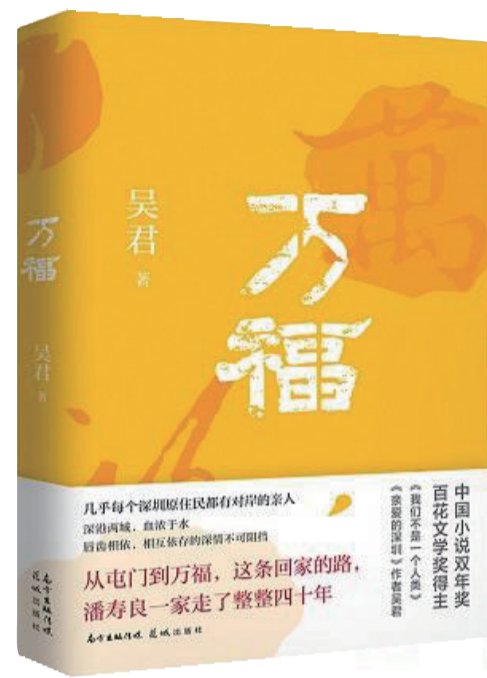
□孟繁华

万福是一个地名,具体地说是一个村名。将它作为小说的书名,是如此的吉祥如意,那里隐含的本土祝愿和祝福的情感愿望一目了然。然而,这个祝愿和祝福与事实上一言难尽的艰辛南辕北辙。万福是通往香港屯门的起点,从万福到屯门只有一步之遥,跨过深圳河就是香港屯门。但是,从屯门再回到万福,仅这一步之遥却远胜万水千山。小说的空间是万福、屯门两地,时间跨度40年,其间人物就在这样的时空里演绎了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命运。应该说,为了写这部小说,吴君显然做了充分的积累和准备,这从她已经发表过的小说,比如《皇后大道》《生于东门》等作品中可以得到证实。40年后的李水庵夫妇显然已经看到并正在享受着深圳的生活。后来,吴君开始关注深圳本土普通人的生活。应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深圳来说,只有写出深圳原著居民的情感和精神变化,才能够更深刻、更本质地反映出深圳的变化,而要捕捉这一变化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后来,我们在《皇后大道》《生于东门》等作品中,看到了吴君的这一努力。《皇后大道》写了水英母亲对阿慧嫁到香港的羡慕,然后写水英亲眼见到的阿慧的生活,从一个方面颠覆了对资本主义想象的一厢情愿;《生于东门》写作为父亲的陈雄非常有优越感,但他不过是一个拉客仔。孩子、甚至阿妈都看不起他,儿子陈小根在学校受了欺辱,回到家里再受父亲陈雄的奚落。陈雄的所有遭遇都与他的身份相关。要改变这一切,必须改变身份。自己的身份已无从改变,那么只有改变自己儿子陈小根的身份。改变的惟一途径,就是将其过继给儿子早夭的香港商人。通过《皇后大道》《生于东门》,我们发现,在那个时代,深圳和香港之间存在落差,香港是深圳仰望的天堂,也是深圳人改变身份和命运的一种方式。阿慧要嫁到香港,陈小根要过继给香港商人。至于阿慧切实的婚后生活怎样、陈小根过继后的命运怎样,无人知晓。

大家宁愿相信香港会改变他们的一切,他们此去便是天堂。这是当年的深圳人对香港的想法。

在深圳建市40年前后,吴君出版了长篇小说《万福》。这是一部地道地写深圳本土生活的小说,是深圳原著居民的生活变迁史和精神变迁史,是潘、陈两家40年的家族秘史,是用文学方式演绎的深圳从前现代向现代坚定迈进的社会发展史。小说用血浓于水的方式,讲述了深港两地血肉相连不能割舍的骨肉亲情。这是一部有极大难度和挑战性的小说,吴君用她的方式成功地完成了。小说讲述的是深圳万福村潘、陈两家人40年的故事,是关于出走与回归的故事,在人物命运跌宕起伏、大开大阖中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段深圳和香港的关系及其变化。故事缘起阶段,隔河相望的香港仍然是对岸的神往之地。母亲潘寿娥对阿惠说过的话是:“你只有嫁到香港,我们家才能抬起头,才会不受欺负。”她认为只有让女儿嫁过去,她才算是报了被亲人和恋人抛弃的仇。不年轻的女性嫁到香港才有面子,原著居民都有前往香港以求一逞的深切愿望。于是,“到香港去”几乎成了万福人没有喊出的口号或具有支配性的生活的“意识形态”。于是,潘家三代人毅然离深去了香港。事实上,天下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为某个人准备的。潘寿良、潘寿成、阿珠等,初到香港为了生存找工作惨不忍睹的状况,应该是他们当初也难以想象的。但是,风气一旦形成就无可阻挡。“这一年,村里走掉了200多人,上半年70多人,下半年130多人。”尽管如此,去土难离仍然是万福人不变的观念和传统。故土难离是当时的处境和心境,叶落归根则是不变的文化信念。潘寿良后来和陈年说:“当年,我们这些讨生活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阿灿。我们是阿灿啊。现在看着国家强大了,深圳也富起来了,没人再这样称呼了。”潘寿良的这番话,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万福人去留的根本原因,物质生活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人的尊严更重要。或者说,充裕的物质生活是人的尊严的一部分。万福人离开,是因为贫困以及贫困带来的尊严尽失;万福人回归,是因为贫困一去不返,生存的尊严失而复得。因此,《万福》是一部与深圳40年历史变迁息息相关的小说,也是一曲深圳改革开放40年的颂歌。

深港两地的去留也许在一念间,但是身体的空间挪移牵动的各种隐秘或不隐秘的关系,如波浪般逐渐展开。潘、陈两家的爱恨情仇以及姐妹间反目成仇的过程,在一河之隔的两地渐次上演。潘寿良、阿珠、陈炳根三人是高中同学,阿珠、陈炳根是恋人,在去香港的船上,为了掩护全船人员,村干部陈炳根下



《万福》是一部地道地写深圳本土生活的小说,是深圳本土原著居民的生活变迁史和精神变迁史,是用文学的方式演绎的深圳从前现代向现代坚定迈进的社会发展史。小说用血浓于水的方式,讲述了深港两地血肉相连不能割舍的骨肉亲情。

船受了重伤并有了残疾,被抓去劳改,回来后因为得知阿珠已经在香港结婚生子,一气之下与阿珍结了婚并生下陈水英。去了香港的潘寿良为了阿珠肚子里的孩子不受歧视,也为了阿珠不受工头的欺负而假结婚。潘寿良一直深爱着阿珠却不敢表达,当阿珠怀了陈炳根的孩子准备生产之际,为了孩子不受歧视,他只能假扮父亲。得知陈炳根已经重新开始生活,无奈的潘寿良和阿珠只好在一起生活,并生下女儿阿如。华哥是阿惠母亲潘寿娥的恋人,也是小姨潘寿仪暗恋的对象。似乎天随人愿,潘寿仪终于可以与华哥在一起,可是却需要还债,被母亲逼迫,她不仅要帮着哥哥带孩子,还不能结婚,只能与华哥保持这个不清不白的关系。因为等不到潘寿仪,又要延续子嗣,华哥只好另娶了香港女人。还在万福的潘寿娥对华哥和妹妹恨之入骨,一气之下与外面的人相好并生下阿惠。阿惠作为小说的串线人,她当初被母亲用弟弟相亲、哥哥娶亲的方法送过罗湖桥嫁到了香港,成了一个病人的老婆,为了保护母亲的虚荣心,也为了心中的马智贤,阿惠选择留在了香港,并用双手撑起了全家的生活。改革开放后,家中老大潘寿良多次梦想带着弟弟妹妹回到万福均没有成功。只有阿珠因为误会阿惠和潘寿良的关系,带着潘田和阿如赌气回到了万福。而结婚的消息被家中次子、惯于惹事生非的潘寿成传回了万福,万福试图让陈炳根死心,也导致了陈炳根对潘寿良和阿珠心生怨恨。潘寿成后来与一个来港做工的女人相好,女人跑掉后,留下两个孩子,由二妹潘寿仪帮忙抚养成人。潘

田的特殊身世倍受歧视,导致性格叛逆,直到40岁也不想结婚。他痛恨经常来到家里照顾他们的陈炳根,作为陈炳根的亲儿子这个秘密被潘寿良一直守到最后,为后面潘寿良和陈炳根的和解埋下了重要伏笔。而抢走了姐姐妹妹的潘寿仪被潘寿成当众羞辱而无力解释,后来与一个外地来写生的男子远走他乡……

应该说,这些小人物写得真实而生动、丝丝入扣,顺应着小人物的情理、命运。尤其潘寿良这个形象,作为家中老大,他的口头语是“可以可以”,仿佛他能扛下生活中所有的难。他被母亲、兄弟姐妹、恋人、孩子、朋友等几乎所有的人怨恨,可是他都选择默默地忍下、吞下,不作解释,这是一个中国家庭里典型的老年形象。《万福》的背景是深港两地的归去来,从出走走到还乡,看似家国的宏大叙事,但撑起小说基本框架的,还是这些小人物血肉之躯和情感关系。作为一个隐喻,《万福》是深圳乃至国家和人心40年变化的隐喻。小说最后是大团圆的结局,潘、陈的“和解”是“万事兴”“和为贵”的具体演绎,是人心向善的理想表达,当然,也是小说最后向所有人道的一声“万福”。

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我觉得小说语言略嫌平淡,特别是人物之间语言的差异性、辨识度不高,这是一个大问题。我觉得吴君短篇小说语言很有感觉,长篇要差一些;其次,对过于切近的生活,提炼得不够。人物和故事都太“实”了,这是当下小说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果能够再空灵些或有飞翔感,小说的面貌可能会大不相同。

## 镌刻在武州山上的文脉

——读柯文辉长篇历史小说《云冈魂》 □李小白

## ■ 短评

人类的历史首先是存留在石头上的。从石器到岩画,人类就是靠着这大自然馈赠的坚硬,跌跌撞撞从蛮荒走向文明。摩崖石刻、碑文石经,或是汉画像、石像等等,石材在中国匠人手下愈发天工凿巧,及至佛教东渐中土,汲取古希腊罗马造像艺术又充满古印度文化精神的健陀罗造像,沿着古丝绸之路,经河西走廊,直达大同,云冈石窟应运而生。柯文辉的小说《云冈魂》,字里行间透露着对这个造就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巨大成就的拓跋氏王朝无限的感叹。

“云冈”是一个明代才出现的地理名称,此地原本称作“武州山”,作者将其作为一个时代的符号,意在透过人们熟悉的语言去展现更宏阔的历史,揭示更深层的情感。小说《云冈魂》的故事,也就沿着回溯的思路回到那个激动人心的时代。

黄沙悲鸣,宫门次第开启,千年悲风裹挟着历史的尘埃扑面而来。九州原野,战火纷乱,由南至北,满目疮痍。100多年间,南面的朝廷与北面的政权对峙相望,南北文化也在以文明与暴力交织的方式互相浸染。拓跋鲜卑从草原奔来,自其踏入中原,便凭着一股干云豪情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自信,与南朝精致柔靡又不失气度的汉族互相相对冲,在这个过程中势必引起不断撕裂与弥合的阵痛,碰撞出灿然火花。小说第一章写的是昙曜,他是云冈石窟开凿的关键人物之一,也是北魏知名的高僧,在北方地像零落、佛事断绝的情况下依旧固守初心,持然其身,“法服器物,不暂离身”,常为后世称道。从他引入整个故事,不难看出作者用笔之精妙。熟知历史的人自然知道昙曜一生的

经历和归宿,但在《云冈魂》中,你会惊讶,世上竟然真的有如此虔诚的僧,如此慈悲的人。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候,也依旧心向光明。在阴云笼罩之下,依旧秉持信仰,心中的信念屹立不倒,依旧是佛法的光辉便依旧照耀。在柯文辉笔下,历史上那个昙曜仿佛活了过来,甚至成为近“佛”的人物。他无畏充满凶险的前途,不计较个人的生死,心中只装着佛祖,时刻保有一颗慈悲心肠。他的这种恍若与生俱来的善,甚至感化了押解他的差人,这不能说不说佛法的力量。

历史上的灭佛如滚汤沃雪,但在书中只是一个短暂的开端。很快地,继位者为了大局考量,又再次掀起“兴佛”的浪潮。原本面临死亡、阶下囚一般的昙曜,摇身一变成为世所敬仰的大贤。云冈石窟如此兴盛,不能不说是昙曜的智慧,也让人不得不感叹强权之下宗教文化求得生存发展的无奈与狡黠。书载北魏文成帝“命匠造工,刊兹西岭;注诚端思,仰模神影;庶真容之仿佛,耀金晖之焕炳”,让他僧人石匠按照自己的容貌去塑造佛像。帝王的威严被附加在佛陀的神圣之上,宗祠礼制变化为新的信仰。这与其说是一代君主、一个王朝的自信,毋宁说是佛教文化艰难求存、适应性发展的一个胜利。昙曜主持修建的云冈“昙曜五窟”承文成帝旨意,雕凿五尊主像,分别对应北魏五位帝王。书中说昙曜是因感念文成帝恩德,故将佛像建成他的模样,但这何尝不是一种委婉的托词。历经了黑暗的洗礼,即便是最坚持的僧人,心中恐怕也有了计较,依照帝王来凿佛像,未尝不是一种权衡与退让。书中第二章将故事引入宫廷。作为

宫廷真正的主人,冯太后无疑有勇有谋,既顾得了大局,也拘得小节,单论她的雷霆手段和冷酷做派,也称得上是女中英豪。然而表面慈悲的她却谋权夺位、不贞不节、鸩杀亲子、愿将仇恨,做下的事桩桩件件都够得上遗落后世骂名。但是她错了吗?似乎没有,她历经过最残酷的斗争,九死一生,最终成为深宫试炼中侥幸余生的怪物,唯有靠心肠狠硬才能存活下去。她只为一己私欲吗?是又不是,她在利己的同时,似乎也未忘却天下苍生。尤其是在面对昙曜时,首次表现出忏悔。面对李冲、王辰之死,她也内心悲恸、懊悔。在要毒杀自己的儿子时,又一度陷入良心的梦魇。

这是柯文辉的一贯笔法,他站在历史的高度探讨人性。看似写历史人物,又似乎是写他心中的人物。因为历史上的人物也不尽真实,柯文辉却用自己的感悟,剥去历史上赞誉颂扬的虚伪外衣,将人性赤裸裸地暴露在炎炎烈日之下,让它们深受良知和世俗的拷问。

《云冈魂》并没有大费周章地去为你描绘那山壁的石窟有多少个,窟中的石像又是什么模样,而是耗费笔墨去写人,高贵的、低贱的、残忍的、良善的,上到帝王将相,下到市井百姓。什么才是魂?人就是时代的灵魂,而这些时代人格也正是云冈之魂之所在。山上的石像不通世情,一双眼却看透众生。柯文辉看似在说佛,然而谈的更多的是人性。平民百姓心存仁爱,充满真情,帝王家却骨肉相残,打破世间伦常。天道轮回,报应不爽,似乎都是来世的结局,如果这样说,那么一切似乎都有了解释。现世的一切都应当交由来世解决,即便面临苦楚,也依旧要心存善念。

## ■ 创作谈

我终于开始怀旧,过去怀的是故乡,现在怀的却是深圳的当年。

1997年,我还是电台里的一名记者,时常会进出在名声大噪的劳动村,那个曾经靠打鱼为生的小村,那个被称为基因人的特殊部落。

当年的劳动村每天接待客人成千上万,村委会的高档车傲慢地停在豪华的村委会门前,不仅彰显着它新贵的身份,也时刻昭示着他的强劲和不凡。统一的住房、统一的装修,甚至于村民迷乱的眼神也是统一的。这些昔日的渔村村民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也没人告诉他们这从天而降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不久前,当我再次路过那里,昔日的风光早已不复存在。劳动村、岗厦、蔡屋围、白石洲,如今已变成了以外省人为主的地方。取而代之的是林立的商厦和高楼,曾经的原住民风光不再,曾经的“南漂”却已过上了优渥的生活,虽然他们的内心时常还会游荡在故乡与深圳的长途车上。

就是这样的斗转星移,就是这样的沧海桑田。千禧之年,除了夜色里见证过深南大道上茫然失措的人群,我还见证过深圳农村城市化,深圳人的各种口味被我收了满眼满心。这一块胶着了各话题的土地,无时无刻不牵动着国人的神经。

香港与深圳,这一对血肉相连的双城,从古至今,缔结他们的绝不是物质上的供给互助,还有更为具体而真实的情感依偎和守望。试问哪个深圳的原住民没有香港的亲人?这部长篇我断断续续写了3年。3年中,我追寻了陈炳根、潘寿成、潘寿娥、潘寿仪生长的土地,我也赶去了阿惠成长并栖身的屯门。生意人潘寿良与村干部陈炳根两人分别在深圳、香港两地各自成长的足迹是许多个深港两地亲友半生的写照和日常。潘家三代人,由于当年的离深赴港,每个人的命运都被深刻地改变过。虽然小说有了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局,可物是人非是这40年的万福人的真实经历。他们有的做了西乡大道一侧的房地产大佬,有的则是文家祠的一名保安员,有的离乡背井躲避追债,还有的成了与交警捉迷藏的摩托仔,有的我在某个小说里遇见过他们,有的则在我的内心生根发芽成林……这些年,他们富过穷过,被历史的大浪淘沙。他们的内心与那些外省人一样,开垦过、缝合过,变成一道外人无法看见的伤疤。

这所有的一切曾经实实在在地进入过我的视野,影响过我的认识,改变过我的生活。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命运,我的目光不可能投向这里,如果不是因为写作,我的生活不会与这个人群以及他们的命运产生交集,更不可能如此紧密地随着这座城市脉搏一起跳动,血脉贲张、爱恨交集,对人心挖地三尺不肯罢休。

深圳没有限制我,反而一直在成全我。我希望把中国最活跃的人群和他们所创造出的这个大都会持续嵌入到我的书写之中,用一个个故事串起深圳人的心灵秘史。这是我的动力所在。

屯门到万福,是回归之路,也是幸福之路。

## 我家住在南海边

□吴君

## ■ 第一感受

## 从容飞渡

□蒋郁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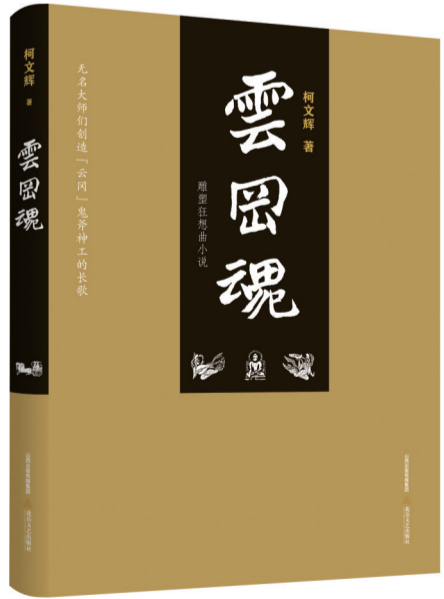
诗人庞白好舞文、好弄墨、好摄影,把北海傍晚的火烧云拍得似凝固的猪血一大块。那种高压悲壮的感觉,让我很有共情。年轻时的庞白颇有一股俊朗清气,“飘飘乎其思,浩浩乎其气,落落乎其襟期”,感情抒发的尺度有些大,但没有语法限制的思想,反而凸显他刚直性情里那无边的温柔和善良。情立市桥,主动疏离,不去打扰天地秩序,不去扰乱他人的安宁。

在庞白的散文诗新作《唯有山川可以告诉》中,“沉默”是高频出现的词汇。一个作家,一个诗人,他明明在不断说话,但他偏要为自己掩耳盗铃,他偏不说“我手写我心”,他只说山川沉默,大海也沉默,人最高贵的也是沉默。庞白觉得语言是他的桎梏,他生怕一不小心就暴露他的生存环境和精神处境。他绝虑忘尘缘,不论晴雨,如行山阴道,随物宛转,目不暇接。“竹椅斜躺,蝉声如梦”,满载一船星辉过来。庞白的散文诗处处是因缘和合、因缘相应。从当初的不立文字,自然发展到不离文字,这不正是诗人佛心的和合吗?

因此,我要说,庞白之于当代散文诗,是他一方面丰富了现代新诗的语言,另一方面是试图放慢当代散文的节奏。他重新定义散文诗,努力将这种文体的美发扬到极致。他在写猫儿山的文字里说:“美有美的缘起、延展和纵情,也有美的内敛、节制和神秘。”我认为这句话正好可以概括他创作散文诗的美学标准。

在一般读者的古典文学世界里,“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方能表现出孕大含深、动荡不安的性格。如果像谢灵运那样,一边叙出游,一边写见闻,最后还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势必雕琢多,偶句多,形容多,为尚形似而色彩繁复。庞白是一位有浓重古典情怀的诗人,他内心的跌宕起伏,非常巧妙地被他那不卑不亢的外形气质掩饰。黑白两种色调交互,在他的视域里如此和谐。纷至沓来的山川、岁月、人情、困惑,既坚硬又柔软。“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他又经常巧妙地避开颜色,避开沉重,避开矫情的思念。当悲伤收起,大地无语,庞白以他的刚健、简约、明朗、柔情和内在超越,表现了一个诗人的魅力。

坐看云起,坐久当还,“唯有山川可以告诉——除了耐心,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渡过时间之河。”



小说《云冈魂》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民族要充满文化自信,在面对滚滚涌入的外来文化时,要张开胸怀,兼容并蓄。正是这种强大的自信,才能创造出不朽的文化。同时,一个民族要爱惜自己的文化遗产,要坦率地迎接不同文化、不同声音,但也不能盲目跟从、一味模仿,不能丢失自己的特色,亦不能丢掉本土文化的精粹。如果说现实的云冈,是一个王朝自我心理和强大精神意志的物化体现和观照,是一个民族昂扬自信的成功书写和炫耀,那么柯文辉书中的云冈便是一个符号,是几百年风烟滂沱的缩影,是北魏气吞万汇、胸纳千钧的写照,是“举世罕匹”的文明和精神的映现,是充满佛性和人性交相辉映的集萃之大美。